

# 哈尔滨文史资料

第五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录

史桑记  
哈尔滨

# 记哈尔滨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的几件事

高 成 儒

我于一九二四年九月考上交通部的官费生，来到哈尔滨中俄工业大学读书（现哈尔滨工业大学）。一九二五年秋，经党组织的培养和火热的革命斗争锻炼，由中共哈尔滨特别支部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不多日子，中共哈尔滨地委（后改为北满地委）就指示我参加国民党的工作，从一九二五年开始，我以一个国民党员的身份工作了两年多。所以，我知道哈尔滨市国共两党合作的一些情况。诚然，由于事情已相隔了半个世纪之久，加上我年已八旬，记忆力差了，在回忆中，难免出现差错，希望史实详知者给以纠正。

一九二五年，哈尔滨党的组织（中共哈尔滨特别支部）根据中共中央执委会的决定精神，在哈尔滨组建国民党哈尔滨特别市党部。中共哈尔滨特别支部以吴丽实同志为首的中共党员大都参加了国民党哈尔滨特别市党部的工作。当时国民党市党部的主要负责人是中共哈尔滨特支宣传委员海涛（后脱党，去台湾），其它委员我记得还有哈尔滨三育中学的教员韩乐然（朝鲜族，中共党员），哈尔滨法大的学生张冲（国民党员），还有几个委员，我只见过面，不知其姓名。当时，哈尔滨市国共两党合作得很好，思想和行动比较一致。因为国民党市党部负责人和委员大多数是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国民党右派没有什么人参加市党部工作。当时两党都拥护广州革命政府，支持北伐战争，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积极主张打倒列强，打倒军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在哈尔滨积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扩大革命队伍，壮大革命

力量。

一九二六年的四月前后，在哈尔滨南岗区成立国民党第三区党部，当时南岗区归东省特别区管辖，别的地方是否成立过区党部我就不太清楚，南岗区为什么排第三区我也不太清楚，只是上级通知成立第三区党部，就得服从组织指示去参加会议。当时东北三省处于军阀统治时期，国民党的活动也处于地下，因此，成立国民党第三区党部也是秘密进行的。当时开会的地点在南岗松花江街与北京街拐角处附近的一所大约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里。那天早上，二十几个人，象走亲戚串门那样陆陆续续地来到会场主要避免特务注意跟踪。当时开会很简单，大家来齐了围坐在一起就开。会议是由国民党哈尔滨特别市党部负责人海涛主持的，他首先讲了会议要求和纪律，然后选举国民党第三区党部的领导成员，经过到会人讨论，选出委员三人，有甘景孟、李彩和我，由我担任常务委员，为本区党部主要负责人。甘景孟和李彩都在铁路局当职员。会议还讨论了如何开展工作问题，要求积极向群众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支持北伐，打倒列强、打倒军阀。会议还重点要求积极发展组织，并做了具体分工：在全市各学校的学生中发展组织由我负责；铁路方面及其他部门的组织发展工作由甘景孟和李彩两人负责。

铁路局方面的情况我不太清楚，在全市学生中发展组织的情况是这样：法大经过积极工作发展了十名左右国民党党员，其中有张冲（后参加市党部工作）、崔光弟、张义儒、阮同益、程宪刚、王道之等人。哈工大方面除了四名中共党员（包括我在内）和两名共青团员参加了国民党外，再没有发展新的国民党党员。许公中学方面，赵尚志同志工作积极大胆，发展了几名国民党党员，我只认识人，不知他们叫什么。总之，在一九二七年前，组织发展工作还是不错的。

我记得国共两党合作时期，宣传工作开展得也很活跃。国民党内的宣传刊物能经常有人秘密从南方运到哈尔滨，当时我就曾负责保管一部分刊物。我是工大学生，不被警特注意，又加上我上课的教室后面有几张空桌子，总靠墙放着，我把刊物放在里面，偷偷地把两张桌子上了锁，原样靠在墙上，这样保管相当安全，需要时很容易取出。

当时中共党组织有些比较重要的文件和国民党市党部的图章由吴保泰负责保管。因为他有一个同乡（江西人）是同情革命的，在意大利领事馆院内住，职业是成衣匠。吴宝泰把这些文件和图章寄放在他那里保存，从未出过毛病。一九二六年六月，吴保泰被调到大连从事地下工作，这个保存中共党内文件和国民党市党部的图章的任务就交给了我。

在哈尔滨国共合作期间，也是有左右派之分的，当时左派占多数右派只有几个人。在工作期间，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人：有一个名叫张冲的人表现很好，当时他是法大的学生，是国民党党员中的左派，思想比较进步。中共哈尔滨地委曾一度责成我设法在实际斗争中，经常接触培养他，使其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六年秋，我和张冲曾共同住在阿什河街一个俄国人的房子里，相处得很好，无论谈什么事，都能谈到一起，他本人很活跃，性情很开朗，革命积极性很高。由于我俩都是本党的活动积极分子，无形中我们的住处就成了两党组织交换情况、传达指示的联络点了，人来人往，很容易被军警宪特察觉，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给组织带来麻烦，经过请示我俩只在一起住四、五个月就分开了，但仍然经常接头，我常给他找一些有关马克思的书籍看，帮助他了解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等等。就在张冲刚有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欲望时，不慎被捕了，原因是他在学校和同学谈话时说了一些进步的话，没有注意隐蔽自己，被别人告发，警方认为他是过激党人，就把他捕了起来，直到一九二九年，张

学良服从南京政府，听从蒋介石的时候，东北全境被捕的国民党党员全部释放了，张冲才被放了出来。听说他出狱后还回哈尔滨市党部任过职，后来他到南京，在国民党中央政府里成了一个能够接近蒋介石的要员。抗日战争爆发，南京政府迁到重庆后，他在那里曾与周总理有过一些工作上的来往，在国共合作的事业上曾起过一些作用。后又听说一九四一年他在重庆因病去世了，当时他很年轻，也有人说他是被蒋介石的特务谋杀的。

再一个人叫杨振声，他是哈尔滨国民党右派的骨干分子，他坚决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思想相当反动。海涛对我说过，他在市党部工作时曾和杨振声敷衍过。有一次，当我被组织派去接头之前，海涛告诫我，杨振声很坏，和他接头说话要注意。在我和他接头时，也确实感到他非常反动，言谈举止表现很阴险。他在哈尔滨干了很多坏事，很孤立，没有几个人跟随他，当时吴丽实同志代表党组织和我讲，杨振声向东北军和警方告密破坏了哈尔滨日报社，“九·一八”后金伯阳同志也代表组织和我谈过杨振声是个民族败类。一九二六年杨振声是哈尔滨道外《晨光报》的编辑，和在沈阳的国民党中央委员朱霁青有密切联系，专门研究如何对付共产党。一九二六年中共北满地委创办了自己的党报《哈尔滨日报》但在内部名义上都是国民党哈尔滨市党部的机关报，报社的地点在道外升平街129号，社长是穆景周（国民党党员，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常刊登一些进步言论，如：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支持北伐等，但没有公开刊登过共产主义内容的稿件，这样更有利于发动群众，教育群众，还不能暴露自己。可是，不知什么原因，有一天《哈尔滨日报》竟刊登了从《共产主义ABC》一书上摘录的一些段落。杨振声如获至宝，立即向警方告密，《哈尔滨日报》便被警方查封了。

杨振声不仅是国民党的极右派，而且还是民族的败类，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汉奸。一九三二年（或一九三三年），杨振声

在哈尔滨市遵照伪特务的指令，派人伪装国民党市党部的人到孙朝阳部队找孙朝阳假说国民党哈尔滨市党部召开重要会议，非请他去不可。当时属下有人怀疑，感到这个时候不会有什么重要会议一定要孙司令去，就劝阻孙不要去，防止出事。孙朝阳不听，反而听信假话，急急忙忙跟着这个人去哈尔滨。当火车开到哈尔滨西边的王岗小站时，日本宪兵和特务就上车箱搜寻，最后找到孙朝阳，把他逮捕了。后来听说孙朝阳被日本特务杀害了。杨振声这一卑劣行径，得到了日本特务机关和伪满政府的赏识，委任他为哈尔滨市高等警官学校的教育长。

（穆之整理）

# 我所经历的哈尔滨学生运动

高 成 儒

我是一九二四年秋来到哈尔滨中俄工业大学（后改为哈尔滨工业大学）读书的，这期间，我曾积极参加了哈尔滨学生运动，并领导了哈工大学生运动。当时我所亲历的情况是这样的：

## 一、在哈工大组织“群进社”

一九二五年上半年，哈尔滨中俄工业大学以吴保泰和我为核心，在中国学生中组织一个进步青年学生组织：“群进社”。参加这个组织的都是比较进步和关心国家大事的同学。常常聚在一起，互相交流思想，学习进步书刊，研究和探讨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使群进社员思想和觉悟得到提高。在“群进社”中有两个社员对我影响很大，一个叫余新亚，是孙中山先生的热烈拥护者，探讨会上，他常谈对三民主义、三大政策的见解。由于他的讲解，使我和许多社员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了正确的认识。另一个名叫彭泽，是湖南人，曾被派到过苏联。一九二五年夏季我和他在陶赖昭至哈尔滨的铁路沿线，一块从事两个月的野外实习，在接触中知道他非常赞成共产主义，愿为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而献身。他在社员中经常讲解马列主义，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激发了大家的革命热情。可惜的是余新亚、彭泽同志在一九二五年冬不幸去世了。

一九二五年发生的上海“五卅惨案”，激起了上海工人的愤怒，纷纷集会，罢工游行示威，抗议帝国主义的罪行。全国学生界也掀起了壮烈的爱国主义运动，抵制日货运动。当时，哈尔滨各界群众积极参加支援上海工人的罢工运动，全哈尔滨的学生大

多数走出校门参加这一运动。我记得，哈工大虽然中国学生不多，但在“群进社”社员的倡议下，也把在校的中国学生组织起来走上街头，参加支援上海工人罢工运动。提起这一运动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当时哈工大学生分成许多小组，在道外（当时为滨江县）正阳大街上，进行演讲，由于我的口才较好嗓门也大，每次出去我都拼力演讲，听讲的人很多，有些人看到我激愤的样子，他们也情不可遏地和我一起高呼口号：“打倒帝国主义！”“一切帝国主义者从中国滚出去！”参加这次运动，给哈工大学生运动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 二、学生党支部

我于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就参加了共青团北满地委的工作。到一九二六年秋，哈尔滨五个学校共有共产党员八人，中共北满地委决定组织一个统一的学生党支部，责成我担任支部书记。八名党员有工大四名，吴保泰、罗纯化、申钟岳和我；法大一人，韩俊义；许公中学一人，赵尚志；医专一人，潘连山；哈一中一人，段中和。当时学生党支部的主要工作和任务是：在各校组织学生会，开展各种进步活动；发现和培养进步的学生，发展党团员，扩大学生党团队伍。在组织学生党支部之前，海涛当时通知我，新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的学生中有三名共青团员，他们是申钟岳、宿景阳、岂文彬三人，申钟岳到工业大学读书不久就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了（由我给他转的，在组织学生党支部时申已转为党员了）。

## 三、学生会的建立与活动

哈工大学生会的建立比其他学校组织得快一些，进行的工作也比较顺利。原因是在哈工大的“群进社”有十余名社员。大家

共同在学生中进行活动，筹划组织中国学生会的工作。那时工大除本科有中国学生六、七十人外，预科有三个年级，共有学生约一百二十人。在组织学生会的过程中，曾遇到过许多阻力，经过共同努力，终于在一九二六年末组织起哈工大中国学生会。当时，工大中国学生中多数人思想不进步，他们的力量最初占上风，在这些学生中，有一个叫曹秉钧的，是社会上腐朽势力的积极拥护者，他名利心强，很能讲一套。此人比我高一年级，在思想右倾学生中有一定影响，有不少拥护者。本来他和那些思想右倾的学生不关心成立学生会，甚至反对在学校成立什么同学会、学生会等，可是后来当学生会将近组成时，曹秉钧出于别有用心目的，摇身一变，成了一个热心的组织者了，他在幕后做了许多工作，把大多数右翼学生拉到他一边去，等到学生会成立时，他篡夺了哈工大学生会的大权，当选为学生会会长。他一上台，就积极张罗筹办跳舞晚会，进行募捐，美其名曰为学生会筹备经费，其目的就是想把学生会办成黄色的学生组织。以这种方式阻止学生参加进步活动，他的效力得到当时官方人士的大加赏识和赞助。他这种背叛学生的行为，在那一次他主办的跳舞晚会过程中暴露了马脚，犯了严重的贪污罪行，引起了同学们的愤恨，一致要求把他赶出学生会。那时，学生会的组织内部有一个代表会，我在代表会中有一定的影响，代表会根据同学们的要求召开了紧急会议，组成查账委员会，选我担任主任委员，经过复查，曹的问题很多，贪污了捐款。曹秉钧的问题，对好多同学教育很大，使许多同学在某些问题上有所认识，思想上有所提高。在我担当代理会长不多日子后，曾召开一次代表会，对由曹主持下定立的会章，进行了讨论，认为应进行修改，并选举了一个委员会，主持修改会章的工作。在修改后的会章上取消了会长制，规定执行机构为执行委员会，由代表会选举五人组成，并由五名委员选委员长一人，副委员长二人，主持学生会的工作，在

新会章上加强了代表会作用，成为监督机构。

在新的学年开始后，我被选为代表会的主席。在选举执行委员会委员时，出席代表会的全体代表一致主张我应担当执行委员会的一名委员，结果，我也就选为执行委员了。该会的委员长是由执行委员来选举产生，在选举中，全体委员又推选我为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长。当时我认为一个人兼两个主要职务（既是代表会主席，又担当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不利工作，可是大家不同意我的意见我只好承担下来。其后在各位委员和同学的帮助和支持下，我顺利地完成了（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七年）那一年学生会工作，为我校学生会之自治、走上正规打下基础。

在哈法大，韩俊义也曾与法大的国民党员共同组织成立了学生会，卓有成效；在哈医专，潘连山也在学校进行工作，建立了学生会；在许公中学，赵尚志在学校主持组织学生会过程中有些急躁情绪，条件还没有成熟的时候他就急于求成，结果导致他被学校当局开除，该校的学生运动受到沉重的打击。

赵尚志同志，当年十八岁，家住哈尔滨道外。他被学校开除后，没有回家，而由党组织安排，同我住在一起。当时，我住在秋林东边不远的邮政街二十八号，是租一个俄国人的一间屋子，他在我这里住了约有二十来天，就被组织派往广州，到黄埔军校就读。哈一中（特区一中）的段中和也在学校进行组织学生会活动。

#### 四、参加全国学生代表大会

一九二七年七月，我被派作为东北三省的学生代表前往汉口出席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到达汉口时，汉口的革命空气还相当浓

厚，在表面上，看不出国共两党要分裂的迹象。可是，不多日子，反共的势力日渐嚣张，在陈独秀的同意下，解散了工人武装，武汉的革命形势日益恶化。在全国学生代表大会闭幕后，我记得不几天在武汉就出现了国共分裂的局面。当时我染患了急性胃肠炎，被送进医院，住了六天医院。也就是在这六天中，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在武汉向共产党和工农大众开始了大逮捕、大屠杀，公开破坏国共两党的合作，走上了和蒋介石同流合污的道路。我出院后，到处听到枪声，警车鸣叫，汉口陷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当时东北三省国民党驻汉口办事处设在三多里，那里的主持人是穆景周同志，以前他曾在哈尔滨担任过《哈尔滨日报》社长，我到武汉后就是同穆景周同志取得联系，住在他主持的办事处里。我到汉口去开会，组织曾给我一个特殊任务，让我带有密写的党组织的工作报告。这个秘密报告是我和吴丽实同志共同整理的，买了一本旧式装订的石印的旧小说，把他拆开，在反面用米汤写好，干后折迭好重新装订起来，如同一本旧式小说一样。这个报告的具体内容主要是汇报哈尔滨党团组织如何开展工作，和党组织是怎样遭到敌人大破坏的，今后如何健全组织和开展工作，请上级组织指示等等。这份报告是在我临走时，由吴丽实交给我的。我在一路上，时刻注意这份报告的安全，总是拿在手中翻阅着，在外人看来，我是在看一本文学书，安全地到了汉口，到汉口后和穆景周同志一起，把密写的报告显示出来，共同进行整理，其后，由穆景周同志陪同我一起到上级机关交上了这份报告。当时穆景周给我介绍了全国和武汉的形势，谈到党组织在武汉三镇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他最后说：“现已是白色恐怖的环境了，事不宜迟，你得赶快走，我已给你买好船票，赶快回东北去，但你不必过分紧张，因为你来这里开会是以国民党员的身份，这个身份能保护你平安回去。”我到汉口时确以一个国民党员的身份出现会场公开的，没有一个到会者知道我是共产党

员。在离开汉口时，由穆景周同志交给我由国民党上级组织发下的原哈尔滨国民党市党部工作经费一千六百元整，让我带回去，交给哈尔滨我党组织作活动经费。

## 五、在与党组织失掉关系的日子里

离开汉口后我顺利而平安地回到了哈尔滨，武汉的国共分裂，使哈尔滨的党组织受到一些影响。当时因地委书记是一位姓吕的同志，具体名字记不起来了，于当年八月下旬或九月份就离开哈尔滨前往苏联学习去了。他走后，没人接任团地委书记的工作。党地委书记吴丽实同志在我从汉口回哈尔滨后曾和我接几次头，我俩交换过如何进行工作等看法，后来他也于十月调到奉天中共满州省临委工作去了，由胡步三担当代理地委书记，不久哈尔滨白色恐怖厉害，他也离开哈尔滨走了。其后哈尔滨的党组织的工作由谁负责我不清楚，当时，学生支部也只剩下六名党员，有吴保泰、潘连山、韩俊义、申钟岳、李作非和我，也和上级组织失掉了联系。作为一个党员，不能叫白色恐怖吓倒！可在没有上级指示与领导的情况下，我未能尽到一个组织者的责任，只是同潘连山、吴保泰、韩俊义等人经常保持联系，交换对形势的看法。在韩俊义离哈去苏联之前，我们曾共同商量，不应因组织遭到大破坏而消沉下去。我们要团结起来，保存组织，以便有朝一日与组织取得联系，再为党作些工作。后来，在潘连山同志的倡议下，大家集资买了一条舢板，一只锚和一张网，放在松花江边托人看着，作为学生支部六名同志互相联系的集合点。一旦找到党组织，还要继续干下去。韩俊义在法大曾联系该校几名思想比较进步的学生，参加了我们的活动。我只记得一个叫范桂生的和一个叫黄毅的同学，这两个人在“九·一八”事变后，都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在哈尔滨爆发了全市学生“反五路”的爱国运动，当时哈工大的中国学生会改选了，由申钟岳担任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执行委会下设几个部，有一个交际部，是负责对外进行联络工作的，部长由委员长兼任，我同意在交际部担任名誉干事，以便协助申钟岳进行外事联系工作。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在东北修筑五路，东北军阀张作霖去北京签了卖国“修筑五路”的秘约，引起了全国性的特别是东北三省的学生爱国运动，其气势轰轰烈烈，当时我曾找医专的潘连山同志接过头，主张分头进行活动，发挥我们共产党员应有的作用，并同申钟岳同志在哈工大展开宣传活动，我还和申钟岳同志作为哈工大中国学生会的代表，到哈市一些学校进行串联，许多学校的学生都起来了。十一月五日、七日的活动我都参加了，可惜的是十一月九日的活动我没有参加着，因为当时我因家境在经济上的困难，在道里区初级法院担任的俄文翻译（学余时间担任），当时我每天都抽出时间，到学校进行活动，就是“一一·九”这一天，因法庭开庭我没有去参加。那一天进行的游行并未在事前联络好，而是在十一月九日上午临时联系的，我没有参加游行，曾是一件在当时使我深以为歉的事情，因为我想假如我去参加这次活动，会使事情处理得更好一些。第二天上午，我到哈工大主持了一次全体学生大会，主张继续进行抗议游行。可是第三天正当我们准备活动时，哈工大校长刘哲出头威胁，许多吉林省的中国学生（这些学生在工大占中国学生的多数）都退缩了，结果“一一·九”事件后，哈尔滨的学生运动就陷入了沉寂。不过全国学生运动的继续兴起，终于阻止了“吉会”路的修建，那一次运动基本取得了胜利。

“一一·九”事件发生后，东省特别区的行政长官张焕相由于同情和支持哈尔滨学生运动，被免职了。特别区的警察头子金荣桂，被召到奉天（沈阳），受到张学良的严厉训斥，并指出哈

尔滨的学生运动是共产党在幕后鼓动起来的，叫他马上回哈尔滨严加取缔学生运动，并查清幕后共产党人，逮捕法办。金荣桂回哈尔滨后，不知他在什么地方知道我和潘连山是“一一·九”运动的组织者，决定逮捕我们两个人。当时警方伪造一份文件，作为共产党内部的文件，上面写有哈工大高成儒、医专潘连山，普育中学校长甘乃光等人的字样，作为逮捕我们的依据，金荣桂回哈尔滨不几天就把我和潘连山逮捕起来。在审讯过程中，我义正词严地予以驳斥，使审讯者张口结舌，只得把我们押回监房不管。我被捕后，工大学生会成立了一个营救高成儒委员会，几次向警方要人，金荣桂怕再闹出事来，不好向沈阳交待，只好把我们押了半个月就放了出来。甘乃光被捕与那次“一一·九”学生运动毫无关系，据说当时有人要谋他的位置，对甘进行陷害，才把甘的名字塞进此案，这一阴谋是极其卑鄙的。

在“一一·九”的学生运动中，潘连山、申钟岳和我虽曾起过一些积极作用，甚至说也起到了组织和领导作用，可是当时我们已经同上级党的组织失掉了联系，那一次“反筑五路”学生运动，事实上不能说是哈尔滨共产党有组织搞的群众运动，而是当时哈尔滨市各校的一些学生、群众出于对祖国的热爱，不甘受外势力的欺侮，出现的一次自发性质的学生爱国运动。

## 六、与党组织接上关系，积极开展抗日救国活动

金伯阳同志是一九二六年在哈尔滨工作过的一位同志，在从事地下工作过程中，曾同潘连山同志有过联系。一九三一年四、五月间潘连山同志告知我说：“小金子回来了”（指金伯阳同志），不久就由潘连山介绍我同“小金子”会面了。那时潘连山同志已从哈医专毕业了，在中东路哈尔滨车站当医生。金伯阳同志当年回哈尔滨时已改姓杨，在组织内部称他为“北杨”。当

时东北党的组织内曾有四个姓杨的，即杨先泽称为“南杨”，还有杨一辰，称“山东杨”，杨佐青称“黑杨”，金伯阳同志就被称为“北杨”。当时他是经沈阳中共满州省委派来哈尔滨开辟工作的，到哈尔滨不久就找到潘连山同志。

当年我同北杨接上头后，心中特别高兴，从一九二七年就和上级党组织失掉关系，天天盼，夜夜盼，今天可盼来了，我和北杨接头的时候，还正忙于毕业设计，当时曾下决心加紧尽快完成学业以便可以全心全意从事革命工作。我自从一九二四年开始在哈工大正科读书，本来应于一九二九年毕业，由于忙于革命工作已经耽搁了两年学业，这次见到北杨后，使我更加认识到，我应尽早完成学业，计算三五个月就能完成，我和北杨谈了我的想法，北杨表示支持。

北杨来哈后，党组织的工作经费相当困难，同北杨接头后不久，我就得知北杨有时连吃饭的钱都成了问题。于是，我和潘连山、吴保泰、韩俊义（当时韩已从苏联回国，又到法大读书，和我接上了关系）相商，由我们四人每月各捐助党组织经费十元，四人共捐助四十元，每次由我收齐及时交给北杨同志，那时这一小笔钱对组织不无小补。

我的毕业考试将在这年十二月举行，及到九月份只剩三个月了，那时我正用全部精力进行毕业设计工作。万万没有想到九月十八日突然发生了事变，即“九·一八”事变。国民党采取不抵抗政策，一枪没放，放弃了东北。日本帝国主义不几天就侵占了大片土地，并向北满进犯。当时我的心都要碎了，极度痛心，眼看着东北人民沦为亡国奴，我怎能安心再读书呢？要行动起来动员同学起来救国。可是，又冷静一想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不能控制不了自己，不能盲目行动，要按组织要求行动。于是，我强制自己安下心来搞毕业设计，我自己安慰自己，学校内一定会有人起来进行救国运动的，可是过了半个月，工大同学一直没有人出

来，在表面上哈工大显得死气沉沉。有一天夜里，同学们都已进入睡乡，我反复思索，倒了一些红墨水，搀上了一部分水，用毛笔写了一张措辞简单的文字，为了不让别人知道没有写我的真名，在下款写上“国民一分子”，贴在宿舍的布告板上，内容是：“希望同学明天下午两点到阅报室开会，讨论‘九·一八’事变问题”。当时我曾设想，不会有人知道是我写的，我既能起到发动同学抗日救国，又能保证我学业的完成，以便尽早毕业后，能够全心全意去从事革命工作。没有想到，第二天早饭后，就有一同学来同我交谈，开始我还装作不知道，后来我一问，才知道我贴出的布告虽说没写真名，但笔迹被同学认出来了。当时我本来打算不参加下午的会议，谈话的结果，我只有同意下午参加会议。

下午的会议，参加的人很多，气氛也相当热烈、激昂，真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当时被大家选为主持会议的主席。发言的同学很多，个个慷慨陈词，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无视国际法，野蛮侵略我国东北。会议决定第二天召开全体同学大会。并决定由当天出席的同学分头进行联系，第二天全校同学基本上都参加了大会，会议决定成立工大中国学生抗日救国会，并选出了委员会的委员。委员会分成两个组，一个是总务组，由关民生主持，一个是宣传组，由我来主持，大会决定宣传组派出代表，与哈尔滨各校的学生进行联系，这样，工大的学生抗日救国运动就轰轰烈烈搞了起来，其它学校也动了起来。此时，我专心完成学业的原来打算，只得放弃了，站在运动的前列，一心一意搞好抗日救国运动。

不久，北杨同志介绍我同特委李书记见面，从此，表面上由我起主导作用的工大学生抗日救国运动，实际我已是在特委李书记直接领导下开展运动的，而且整个哈尔滨进步学生搞的抗日救国运动已由特委直接领导。